

哲人石
丛书

当代科学思潮系列

技术时代的 人类心灵

工业社会的社会心理问题

Man in the Age of Technology

阿诺德·盖伦 著 何兆武 何冰 译 何兆武 校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Man in the Age of Technology

by

Arnold Gehlen

Originally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DIE SEELE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
Copyright © 1957 by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Reinbek bei Hamburg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3 by
Shanghai Scientific & Technological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经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授权取得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

责任编辑 邢志华 封面设计 陶雪华
版式设计 汤世梁

哲人石丛书

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

——工业社会的社会心理问题

阿诺德·盖伦 著

何兆武 何冰 译

何兆武 校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邮政编码 200235)

网址: <http://www.sste.com>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华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7-5428-3167-4/N·515

图字 09-2002-446 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375 插页 2 字数 148 000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定价: 14.80 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工业社会的社会心理问题/(德)盖伦
(Gehlen, A.)著;何兆武,何冰译.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6

(哲人石丛书·当代科学思潮系列)

书名原文:Man in the Age of Technology

ISBN 7 - 5428 - 3167 - 4

I. 技… II. ①盖… ②何… ③何… III. 社会心理学—
研究 IV. C9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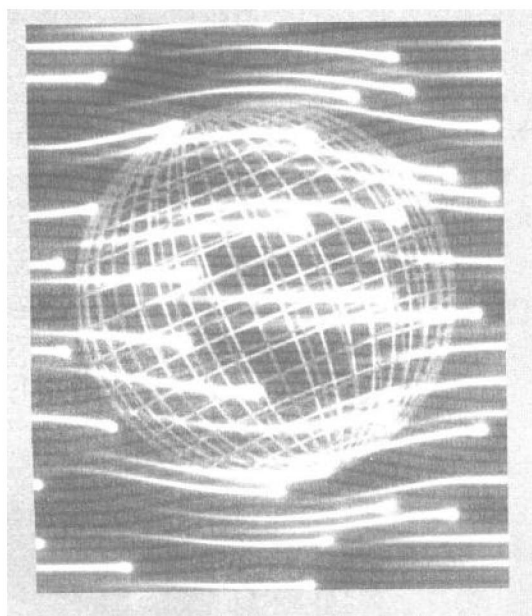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4858 号

哲人石丛书

第二辑

- | | |
|------------------------|---------|
| 人生舞台——阿西莫夫自传 | 48.80 元 |
| 艾萨克·阿西莫夫著 黄群等译 | |
| 人之书——人类基因组计划透视 | 23.00 元 |
| 沃尔特·博德默尔等著 顾鸣敏译 | |
| 知无涯者——拉马努金传 | 33.30 元 |
| 罗伯特·卡尼格尔著 胡乐士等译 | |
| 逻辑人生——哥德尔传 | 12.30 元 |
| 约翰·卡斯蒂等著 刘晓力等译 | |
| 突破维数障碍——斯梅尔传 | 26.00 元 |
| 史蒂夫·巴特森著 邝仲平译 | |
| 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 | 32.40 元 |
| 约翰·齐曼著 曾国屏等译 | |
| 我思故我笑——哲学的幽默一面 | 14.40 元 |
| 约翰·艾伦·保罗斯著 徐向东译 | |
| 共创未来——打造自由软件神话 | 25.60 元 |
| 彼得·韦纳著 王克迪等译 | |
| 反物质——世界的终极镜像 | 16.60 元 |
| 戈登·弗雷泽著 江向东等译 | |
| 奇异之美——盖尔曼传 | 29.80 元 |
| 乔治·约翰逊著 朱允伦等译 | |
| 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工业社会的社会心理问题 | 14.80 元 |
| 阿诺德·盖伦著 何兆武等译 | |
| 物理与人理——对高能物理学家社区的人类学考察 | 17.50 元 |
| 沙伦·特拉维克著 刘珺珺等译 | |

工业社会的社会心理问题



中译本序

我们1989年应台湾巨流图书公司之邀，遂译盖伦《科技时代的心灵》一书为中文，次岁竣事交付出版了本书中文繁体字版的译本，迄今已有10年。因本书的中译本始终未能与祖国大陆的读者谋面，故最近又对全书重行校订一遍，另出简体字修订版的中译本，以饯有兴趣的读者。原书书名德文为 *Die Seele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英文名为 *Man in the Age of Technology*，中译本书名原作《科技时代的心灵》，此次修订版改作《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以期更能确切地符合原意。

本书作者阿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是当代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于1904年1月29日生于莱比锡，1924年就读于莱比锡大学，1927年获博士学位；随后相继在莱比锡、柯尼斯堡(Königsberg)、维也纳、施派尔(Speyer)、亚琛(Aachen)各大学及瑞士高等工业大学各校任教多年，1976年1月30日在汉堡去世，享年72岁。盖伦一生著作宏富，主要有：

《意志自由的理论》(*Theorie der Willensfreiheit*, 1933, 1965)

《国家与哲学》(*Der Staat und die Philosophie*, 1935)

《人：他的本性和他在世界中的地位》(*Der Mensch: seine Natur und seine Stellung in der Welt*, 1940)

《工业社会的社会心理问题》(*Sozialpsychologische Probleme in der industriellen Gesellschaft*, 1949)。1957年再版易名为《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

《社会学》(*Soziologie*, 1955)

《原始人与晚期文化》(*Urmensch und Spätkultur*, 1956)

《时代—图像》(*Zeit-Bilder*, 1960)

《人类学研究》(*Anthropologische Forschung*, 1961)

《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Studien zur Anthropologie und Soziologie*, 1963)

《道德与超道德》(*Moral und Hypermoral*, 1969)

《洞见》(*Einblicke*, 1975)

作为当今西方哲学人类学的主要代表之一，盖伦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费希特)的思想传统，进而发展出一套功能学派的社会人类学与哲学人类学。作者在莱比锡大学就学时，师从当代哲学家杜里舒(Hans Driesch, 1867~1941)。杜里舒在20世纪的20年代即被引入我国，这个名字对我国的学术思想界当不陌生。后来盖伦即继杜氏任莱比锡大学的哲学教授。盖伦的研究路数是从生物学和社会学的观点出发，对人类心灵作出一番新的哲学解释。在哲学上，他反对本体论和形而上学以及任何一种心物二元论和知行二元论：他力图结合米德(G. H. Mead, 1863~1931)的实用主义(社会行为主义)、席勒(F. C. S. Schiller, 1864~1937)的知识相对论与伊林格(Rudolph Ihering, 1818~1892)的整合主

义(integrationalism)、斯宾格勒(O. Spengler, 1880 ~ 1936)及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 ~ 1976)的文化批判哲学而建立一套新观点。他的新观点大致是: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并非是个人的价值而是体制的功能。对人的心灵的研究,一方面他反对使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另一方面他反对“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的“理解”方法。他认为,要解释各种社会文化的体制,就必须采用现象学的方法。人是社会文化体制的产物,故而起强大的决定作用的乃是思想的力量而不是脆弱的生物本能;也就是说,人的生存状态更多地是有赖于并取决于社会的技术手段。这里是指广义的社会技术手段,包括语言乃至神话都在内。人就是这样地创造出了约定俗成的共同文化传统,而这一传统的环境就通过一定的体制而得以延续下来,于是便形成了国家、家庭、法律、经济生活,等等。是社会文化体制把自主性赋予了个人,因之使他得以参加到一个“秘密的协议”(entente secrète)中来。这便是社会文化体制的作用,所谓真理不仅仅是指通常人们所认为的“符合论”(即我们的认识与外在的对象相符合)或是“融贯论”(即我们认识的自身在逻辑上的融通一贯)的产物,而且更是体制这一传统所形成的习惯与信念的产物——它尽管并不具备理性上的或实验上的论据,却并不妨碍其具有不容置疑的确凿性。正是社会文化体制才形成了人们的“指导思想”(idées directrices)和他们的行为,这是任何科学知识都无法取代的。

盖伦大体上是以颇为暗淡的眼光看待现代文明

的。他认为现代文明的特征乃是传统体制的解体并趋向于一种无政府状态的知识化(intellectuation)。物质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远远不是意味着人类的进步,反而是意味着在炮制永远不能满足的欲望——它是与人性中的道德义务背道而驰的,它包含着使人们精神生活庸俗化的危险,并且还会剥夺人们政治生活中的高贵与尊严。科学的日益专门化使得群众日益陷入蒙昧状态,而世界的一体化则会导致人们日益丧失自己的独立与自由。因此,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指明这些衰落的迹象,并且能挺身而出维护传统体制中种种“合法的”成分。盖伦的这些论点,无论正确与否,似乎都对当前正在经历迅速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历程的世界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同时,对于所有想要重建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密切联系的人们来说,他那种力图综合欧洲与美国双方思想理论的尝试,也不失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参照系。

本书中文简体字修订版此次得以问世,系承友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陈启能教授、清华大学方在庆教授与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各位先生的鼎力协助,谨此致谢。鉴于哲学人类学研究的文献目前在国内尚不多见,有关的一些名词术语尚无一致的译法,所以有一些只好以意为之。如有不妥之处,尚望得到专家们和读者们的指正。

译者谨识
2000年深秋
北京 清华园

附：

本书作者阿诺德·盖伦是当代德国著名的社会哲学家，一生著作宏富，包括《人：他的本性和他在世界中的地位》、《原始人与晚期文化》、《时代—图像》和若干文集。本书是从一个广阔的历史、社会与心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从德文所谓的哲学人类学）的视野来探讨现代人和现代文化的诸多问题的。因为中国介绍他的理论的尚不多见，现将此书译为中文，以饕我国读者。

人类在几千年文明史的漫长过程之中，逐步形成了种种固定的社会制度、行为规范、思想模型与心态。然而近代社会和以往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却大为不同，它是一个工业化的、技术的社会，而工业和技术是日新月异的；于是人类就不得不告别以往基本上是稳态的、常规的社会，而步入一个急剧变化着的社会。随之，人类以往备受尊敬的、习以为常的而且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种种制度、习俗、规范、思想、理论乃至感情和心态，也就被迫不断地要改变自己去面对这种日新月异的挑战。但是人类文化生活在这些方面的改变，却远远赶不上且适应不了工业技术的迅猛变化。现代人类文明社会的一切问题、一切矛盾和冲突，归根结底大都可以溯源于此。它不是人类文明某个方面（哲学的、艺术的、政治的、经济的等等）的危机，而是整个人类文明坐标系的危机。本书内容就围绕着这一中心论点而展开，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不少自己的独特见解。当然，对于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不必期待任何一部著作——包括作者这部篇幅不大的、简明扼要的著作在

内——能够作出最后的答案。无论如何,现代化文明的内在矛盾及其所造成的现代人的心理失调和灵魂阴影,乃是每一个人文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所无法回避的问题。盖伦的努力或许有助于学者们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

书中的 modern 一词(及其所衍生的 modernity 和 modernization)的涵义,包含了中文里的近代和现代;我们一律译作“近代”,以期统一。在很多场合,它指的乃是现代(或者当代)。中译文中的错误或不妥之处,我们衷心欢迎读者指正。

译者

1990 年冬

英文版前言

阿诺德·盖伦的书的第一个英译本在他去世4年之后问世,这是一件具有知识意义的事件。盖伦的著作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德文版全集目前正由法兰克福出版社维托里奥·克洛斯特曼(Vittorio Klostermann)出版,是由几位曾与作者有过关系的学者,尤其是卡尔-西格贝特·雷贝格(Karl-Siegbert Rehberg)精心编辑的]。从20世纪20年代中叶至70年代中叶,盖伦是一位多产作家,虽说他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出了名。他的著作在德语的社会科学界和哲学界深有影响,尽管也是颇有争议的。某些争议乃是盖伦政治立场的结果,那立场对于欧洲知识分子的正常标准来说是相当偏右的。幸而盖伦作品中的根本假设和洞见,并不必然地与任何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立场相联系,确实,即使在德国,盖伦也影响了许多在政治上和他有尖锐分歧的人。对他的著作争议多端可能多少和他那文风有关。盖伦是位风格独特的思想家。他写作起来对于漫不经心的读者是毫不客气的,他经常写得很尖刻,因而就需要费点气力才能接触到盖伦的思想。当然,这种气力是很值得花费的。

盖伦著作的中心点是他有关制度的理论,这种理论最初是在若干篇广泛的哲学文章中加以表述

的,后来就被越来越具体地应用于当前世界中的大量社会问题。我们很可以把这一有关制度的理论本身看作就是社会学的运用。但是假如我们看不到它之所以成长的那些哲学根源的话,那么它就会丧失它那大部分的分量了。这些根源属于德文中被称为哲学人类学的学科,也就是说,深植于对人性的哲学反思。在盖伦那里,这一学科是和人类生物学的发现密切相联系着的。因而,撇开他的其他贡献不谈,盖伦在社会学理论和哲学、生物科学间建立了桥梁的这件事,乃是极有意义的。

德国的哲学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赫德尔(Herder)*、黑格尔(Hegel)以及19世纪黑格尔主义的修正者[尤其是费尔巴哈(Feuerbach)、马克思(Marx)和尼采(Nietzsche)等人]。它的直接先行者是现象学(phenomenology),特别是舍勒(Max Scheler)**的晚期著作把现象学的方法应用到哲学人类学上面来。对盖伦最有影响的生物学家是于克斯屈尔(J. von Uexküll)、波特曼(Adolf Portmann)***和邦腾狄克(F. Buytendijk)****。第一次把这一生物学的工作有系统地用于哲学人类学,是由普勒斯纳(Helmuth Plessner)*****作出的,他像盖伦一样,也是在哲学和生物学两方面都训练有素。普勒斯纳也是第一个发掘这

* 赫德尔(1744~1803),德国文学家、思想家。——中译者

** 舍勒(1874~1928),德国哲学家。——中译者

*** 波特曼(1847~1905),瑞士动物学家。——中译者

**** 邦腾狄克(1864~1944),德国动物学家。——中译者

***** 普勒斯纳(1892~1985),德国哲学家、医学家和生物学家。——中译者

一生物研究的社会学涵义的人[《有机体的各个阶段和人类》(*Die Stufen des Organismus und der Mensch*, 1928)],但是他并没有从中发展出一套有关制度的理论。

盖伦的制度理论的生物学出发点是人在动物界中的特殊地位。上述的几位生物学家全都强调 *Homo sapiens* (智人) 与其最相近的哺乳类亲属相形之下的独特性。顺便可以提到,在这一点上他们和盖伦一样,既与生态学家[其中以洛伦茨(*Konrad Lorenz*)* 为首]也与目前的一批“社会生物学家”截然不同,社会生物学家强调人和其他哺乳类动物的共同性。波特曼有关人类胎儿发育的著作在这方面是非常之重要的,他提出了人类有机体发育的根本步骤是在个体诞生以后才开始的,从而就使得发育中的有机体对有机体之外的环境的各种影响特别敏感。人类有机体在诞生时“尚未完成的”特性,是和它那未经特化的本能结构密切相关的。人和所有其他哺乳类动物都不一样,是以“本能的贫乏”(Instinktarmut)为其特征的。因为他的本能并没有给他提供一个可以在其中活动的稳定结构,所以人就面对着一个“开放的世界”,换一种说法,人是以“世界的开放性”(Weltoffenheit)为其特征的。因此,人类的条件就是以极大的不稳定性为其标志的。这些条件在生物学上(进而也就在心理学上)是无法容忍的。所以人类自身就必须以自己的活动来建造出稳定的结构。而社会制度便是“世界构造”这一活动的核心。

* 洛伦茨(1903~1989),奥地利动物学家。——中译者

制度是在文化上被产生出来的形式,人生由此而被赋予了一贯性和连续性,制度填补了由于人的“本能的贫乏”所留下来的“空隙”。它们就缓解(Entlastung)了由本能上没有定向的各种冲动的积累所造成的紧张。它们对人生提供了一种稳定的背景。这意味着人生制度化的一部分可以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是自发地和不假思索地在行动着。根据同样的标志,各种制度由于提供了稳定的“背景”(Hintergrundserfüllung),也就为有意志的、有思想的、有目的的活动开辟了一个“前景”。

盖伦哲学人类学的基本论述见于他的《人:他的本性和他在世界中的地位》(*Der Mensch, seine Natur und seine Stellung in der Welt*, 1940)一书(1950年作了重大修订),其中已经勾画出了他后来的制度理论(theory of institutions)。关于制度的普遍理论的最重要的论述,则是《原始人与晚期文化》(*Urmensch und Spätkultur*, 1956)一书。这部书也包含对远古社会与近代社会之间的对比的详尽探讨,并引入了非制度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这一关键的范畴。远古的制度是包罗万象而又高度稳定的,因而接近于生物学上本能的功能;结果,它们提供了强而有力的缓解作用(即上述那种意义的缓解)。近代性的“非制度化”由于动摇了各种制度的稳定性,所以缩小了它们的范围,从而就为作为思考的合理性结果而采取的行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盖伦对这些过程的分析是复杂而精密的,而其关键性的洞见则是近代社会有某种被嵌入的不稳定性的因素,它对于近代社会里的人生的每一个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本书包括把盖伦有关制度的普遍理论最简洁地应用于分析近代工业社会。它最初出版于1949年，题名为《工业社会的社会心理问题》(*Sozialpsychologische Probleme in der industriellen Gesellschaft*)。本书英文版是根据1957年的修订版，它用了另一个(并不很恰当的)新题名《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Die Seele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修订版为平装本，在德国流传甚广；它或许是盖伦最有影响的一部书。

近代性的非制度化目前更直接地与近代社会的特色有关，其中最重要的各种特点就是由技术而来。假如我们想要理解远古的人的稳定制度是怎样地被剥夺掉的，我们就必须首先求之于近代技术及其所产生的各种意识形式[韦伯(Max Weber)称之为“理性化”]。但是本书的着重点，正如这两个书名所提示的，在于近代制度的心理内涵。这里的关键性的范畴，乃是主体化(subjectivization)这一范畴。

远古的制度是高度客观的(objective)，也就是说，它们是被人体验到的不可避免和信得过的事实，有赖于自然界的事实。近代制度相形之下则缺乏这种客体性。它们很容易被人看作、并且确实被人体验为是各种特殊的构造，它们当下在此处是如此，而明天可能就成为过去；无论如何它们不能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而是随时都可能发生根本改变的。近代的组织是大大被稀释了的制度的典型形式(确实，盖伦也怀疑在他的理论中所阐释的那种意义上的制度一词在这里究竟能不能适用)。描述这一过程的另一种方式——仍然用盖伦的话来说——则是说，近代性大大地缩小了人生的背景(background)而相

应地扩大了其前景(foreground)。所以近代性就是以不断的创新、合理性和思考性,以及一种与之相应的对一切社会秩序的不可靠感和变化形态为其特征的。然而,这种转变并不只是某种在外部、在个人的意识之外所发生的事情。它也要作用于意识(consciousness),而且是生死攸关地在起着作用。

其所以如此的原因,盖伦的哲学人类学作了说明:当近代性已经大大改变了人的社会环境时,它并没有改变人性。这同一个生物学的智人品种依然存在,并且必须与新的环境达成协议。然而,这却是非常之困难的。因为人在本能上始终是贫乏的,需要有稳定性和对行为的可靠的路标。如果社会不能给他造就这种稳定性,那么他就必须多少要在自己的意识之内去寻找这种稳定性了。说明这一点的,还有如下另一种方式:只要是近代性削减了社会秩序的客体性,它就由于这一事实本身(ipsa facto)而加重了人的主体性。这就是盖伦所说的主体化,这是一场深刻的转向内心的过程。这一过程乃是经常受人注意的、范围广阔的各种近代发展之人类学的和社会学的基础——即近代哲学、文学和艺术之朝着主体性在转向,以及自律的个人及其权利这些理念的发展。可是,把这一过程看成仅仅呈现在思想史上,例如呈现在个人主义的那种意识形态的历史起源上,则是一种误解。它不仅只是近代人认为自己具有非常之复杂的主体性而已;他的确在经验上也有着这种主体性。于是主体化就不单纯是思想领域里的一场变化,而是在心理学领域里的一场从经验上说来是有效的变化。至少就这种程度而言,近代